

安徽古籍叢書

杜徵三友朋手札

〔清〕杜冠英等、著 朱曉凱 翁飛、整理

黃山書社

杜徵三友朋手札

〔清〕杜冠英等著 朱曉凱 翁 飛整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徵三友朋手札/(清)杜冠英等著;朱曉凱 翁 飛整理. —合肥:黃山書社,2016.10
(安徽古籍叢書第十五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7-5461-5695-8

I. ①杜… II. ①朱…②翁… III. ①杜冠英(1840-1890)-書信集 IV. ①K82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60353 號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資助項目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選題策劃 彭君華

責任編輯 老 鼓

裝幀設計 馬 芳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郵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230071

印 刷 合肥精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字 數 450 千

印 張 24.875

書 號 ISBN 978-7-5461-5695-8

定 價 80.00 圓

服務熱線 0551-63533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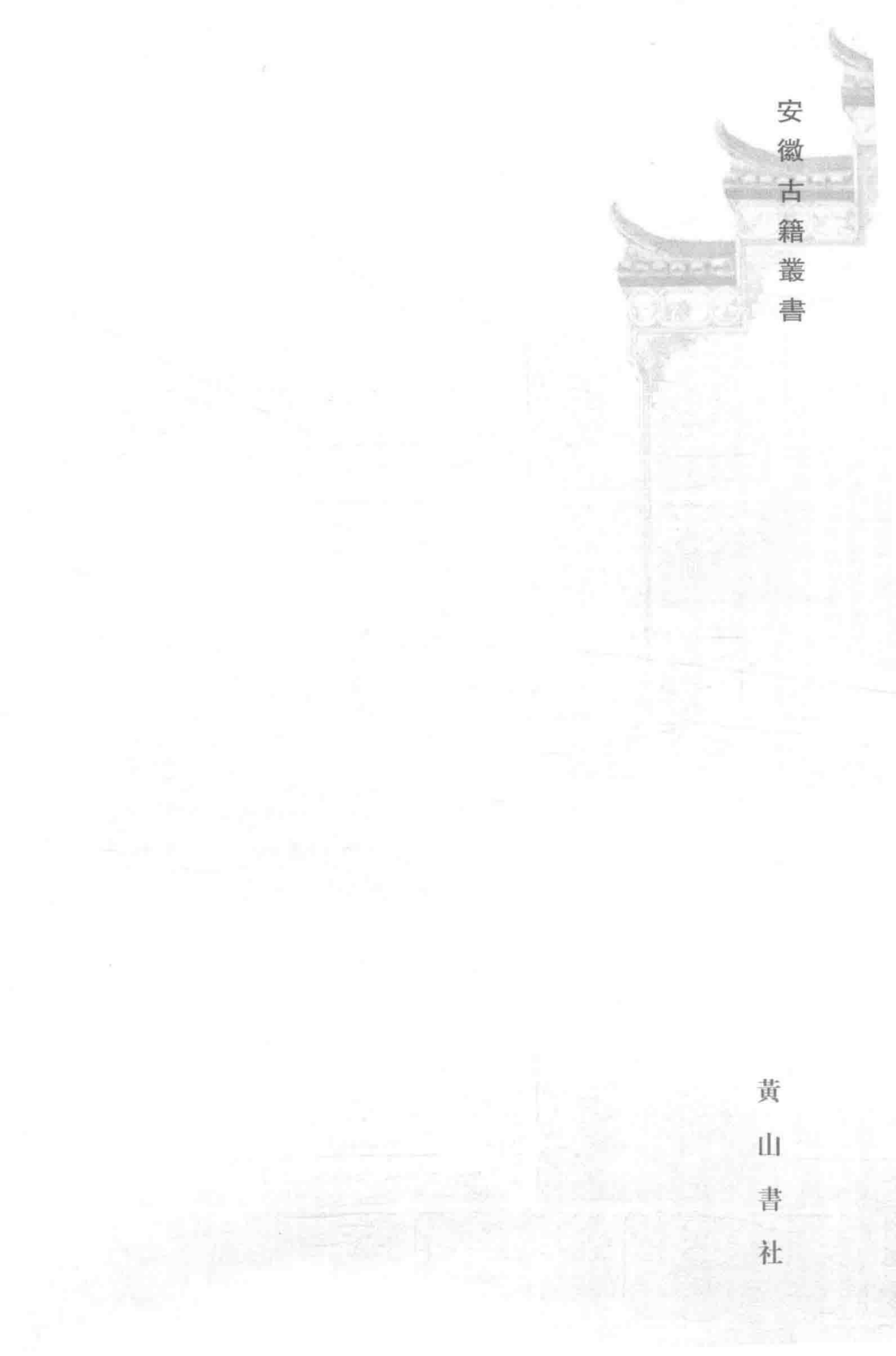
銷售熱線 0551-63533761

官方直營書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本社圖書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制科聯系。

聯系電話 0551-63533725



安徽古籍叢書

黃山書社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

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分類成輯。尤其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

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

儘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兩漢著作及語言、文字之類，皆用繁體字，其餘則酌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

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徵三仁兄大人閣下日前把晤快挹

芝芬頃奉

惠函敬聆壹是海口加釘洋木刻屈冬令嚴寒
宜令兵勇稍為休息自係正辦開正後再
行商酌辦理可也梅墟之事俟鶴笙公牘
到時即當轉稟

撫憲以了此案專復順請

台安不宣

愚弟薛福成頓首

微三尊久丈人麾下吳守備已于緝匪案內
列保此次大記保原以貴勇可造就惟聞該
將粗性未改与人多不睦望為諒勸降打仗
當一往無前至于伺候長官接待同僚均貴溫
和謙讓否則乃是一名冒失勇丁有何用處
耶僕願咸令該將改苦口勸之此煩
知安仰慰弟劉秉璋啟
二月廿六夜

敬告兄大人閣下頃奉

手書敬悉是道本月念九日起概口號十天另紙繕列祈

分寄各營為禱再日昨

尊處發來雨衣共壹件奉有書當即品嘗各營茲據該

營帶先送交到印領共拾貳枝行彙送祈

查收轉詳省為荷為荷專泐佈此新頌

等安

恩弟 歐陽利見

拜

三月念六日

附送呈

印領共拾貳枝計油不共分領壹千五百廿壹
口號十天

川香別

九月廿三日

敬重家。於七月朔日，由去送朝圖後，首修甘年。
（廣州）

大東印務、度色上通

韵 冥 怀 恒

夫人旌懋丕福

禍與休

吳如著

致何瑞亭

地盤士洋行

初

瑞琳見大人閣下甚中，小住快哉。

芒暉

嘉貺頻頌感銘蓬悃
歸途匆促別緒頻增

正德

前言

《杜徵三友朋手札》(下簡稱《手札》)向為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為安徽池州府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人杜冠英與同僚、親朋和同鄉等往來書札函電的留存，總計一千餘通。

杜冠英，字芝生，號徵三，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出生於太平縣民籍，『少隨蘇式敬從戎浙省，督辦軍餉，以功保知府。光緒三年署理玉環同知，檄墾南田海島田三萬餘畝。建鎮海、溫、台各處砲臺十餘座，浙撫命購克虜伯砲置其中，以固防務』^{〔1〕}。在中法戰爭鎮海之役中，杜冠英始終堅守前綫，為此役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正如時任寧紹台兵備道與寧防營務處薛福成所言，『其前敵立功將領，如杜丞(指杜冠英)、吳都司(指吳杰)等應破格保獎，以昭激勸』^{〔2〕}。中法戰爭結束後，杜冠英奉命繼續籌辦鎮海防務，歷時四年，終於主持完成了整個浙東海防體系的建設。一八九〇年他因積勞成疾病逝於任，終年五十歲。

在杜冠英五十年的人生歷程中，有約三十年都是在浙江度過的。浙江位於東南沿海，境內河流、島嶼衆多，特別是杜冠英曾經公幹的玉環、鎮海、溫州和台州等地，有的擁有漫長的海岸綫，有的本身就是——座海島，加上杜冠英任內諸多公務又與『以固防務』有着密切關係，這就不能不使他對加強海防建設有着自己的思考。《手札》主要是從浙江玉環廳同知調任寧波府試用同知及寧鎮海防營務處的杜冠英，

在坐鎮鎮海籌辦海防事務期間所保留的手迹，其中大部分是各方人士致杜氏的書札函電原件，少部分（約一百三十通左右）為杜氏寫給他人的信函底稿。《手札》涉及通信者衆多，身份不一，既有低級官員和底層將領，也有姻親、故舊和洋行買辦等，更有諸如劉秉璋、薛福成、歐陽利見、楊岐珍、宗源瀚、錢玉興和吳杰等參與中法戰爭鎮海之役的關鍵性人物。《手札》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除保留了與鎮海之役有關的大量信函外，還牽涉晚清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堪稱是研究晚清歷史又一份視角獨特、內容珍貴的史料。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手札》一直『養在深閨人未識』，直到二〇〇九年，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在編纂出版《歷史文獻》第十三輯時，才首次輯錄整理了《手札》中薛福成致杜冠英的書札四十八通^{〔三〕}，《手札》這才向世人掀開了『紅蓋頭』。時隔一年，在該所編輯出版的《歷史文獻》第十四輯中，又整理了《手札》中歐陽利見（四十四通）、錢玉興（三十三通）、楊岐珍（三十四通）和劉秉璋（四通）等致杜冠英的書札^{〔四〕}。這些原汁原味的信函，為瞭解、研究中法戰爭期間浙東抗法鬥爭的真實狀況乃至前綫將吏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珍貴史料。

不過已被整理的部分，還僅占全部《手札》的十分之一左右，《手札》中仍有大量珍貴的書札函電尚未能與世人見面。二〇一〇年，黃山市黃山區檔案局為收集本地名人資料，幾經輾轉，從上海圖書館購得《手札》數字複印件，並以宣紙複製技術進行了少量刊印。相信此次《手札》的整理出版，將不僅有助於人們深化對中法戰爭鎮海之役的研究，也有助於從多層次、多角度拓寬對晚清歷史的認識。

一、《手札》是瞭解與研究『民族英雄』杜冠英的重要基础性史料

在對中法戰爭鎮海之役進行梳理後不難發現，杜冠英確是此役的關鍵性人物之一，被譽為『民族英雄』亦屬實至名歸。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署玉環廳同知的杜冠英受浙江巡撫楊昌濬委任，至鎮海協辦海防事務。他多次率人實地勘察招寶山、小金鷄山、安遠砲臺及小港口、笠山等處，在原有海防設施的基礎上，補罅堵缺，重新規劃設計了鎮海口的防禦體系，且從砲臺的選擇、大砲的採購與配置到工程的實施，皆一手經營，全盤負責。鎮海防務歷經四年告竣，為浙東海防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九月，浙江巡撫劉秉璋『又委辦寧鎮海防營務處試用同知杜冠英，時有差委，先後酌給親兵八名』^{〔五〕}，杜冠英實際上成為劉秉璋派往鎮海前綫的代表，他『秉承劉秉璋的意圖，接受薛福成的指示，協調南岸、北岸、砲臺、水師統領之間的行動，負責上下左右情況的通聯，擔任釘樁沉船堵口的重任，並親駐威遠砲臺督戰，為海防第一綫協同一致、共同抗敵做出了貢獻』^{〔六〕}。然而與參與此役的其他重要將吏相比，不僅與杜冠英有關的材料非常缺乏，而且杜冠英本人留下的文字資料也極為有限，這無疑給認識和研究這位『民族英雄』帶來了很大難度。

目前有關杜冠英的生平事迹，主要見諸《太平縣志》（民國稿本，未刊）和浙江圖書館館藏《浙江同官錄》（光緒十二年五月版）等部分資料中，另有一些散見於《鎮海縣志》（清光緒五年刻本）、薛福成著《東籌防錄》以及歐陽利見著《金鷄談薈》等志書、著述中，它們有的未刊，有的內容簡略、零散，且在涉及

與杜冠英有關的重要史實時常常語焉不詳。而杜冠英本人留下的資料也很少，并且大多還淹沒於其他各類史料之中，目前能够見到的杜氏文集，只有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杜氏去世六年後，由其族姪杜璟少量刻印的《杜徵三先生遺稿》（以下簡稱《遺稿》）。在《遺稿》『序』中，杜璟雖盛贊杜冠英『文不廢武，武不廢文，公之才殆不可捉摸也』^{〔七〕}，但整部《遺稿》收錄的杜冠英文稿卻非常有限，僅《玉環海防論》、《重濬玉環溪河記》、《重修玉環廳志序》等寥寥數篇，且基本都是杜冠英在玉環廳同知任內所撰，這就大大限制了研究的範圍與認識的深度。也正是基於以上兩方面原因，目前史學界有關杜冠英的研究甚少，這對於一位從安徽走出去的近代中國『民族英雄』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而《手札》的被發現，則有助於在很大程度上開啓對杜冠英的學術研究，因為這批總數多達一千餘通的書札函電，均以杜冠英為軸心，以近似於『分類主題』的方式收錄成冊，并且涉及人物數量眾多、身份各異，不僅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也可反襯出杜冠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的分量。比如，《手札》涉及的鎮海之役清軍指揮系統的人物，就有浙江巡撫劉秉璋、浙江提督歐陽利見、寧紹台兵備道與寧防營務處薛福成、寧波府知府與營務處提調宗源瀚、統領親兵小隊記名總兵錢玉興、淮軍撫標親兵營統領記名提督楊岐珍、正任台州府知府成邦幹、定海鎮總兵貝錦泉、達字營記名總兵何元啓、鍵字左營副將費金組、楚軍右營副將周士盛、統領南洋援臺五艦總兵吳安康、石浦營參將鄭仙崖、守備吳杰等數十人，幾乎囊括了清軍參與鎮海之役的所有高、中級將領，而數量如此眾多、位置如此重要的將吏均與杜冠英發生勾聯，由此也可想見，雖然官銜僅為試用同知，但杜冠英的地位毫無疑問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通過對杜冠

英與這些將吏的往來信札函電進行梳理，不僅可以深化對鎮海之役的認識，而且也可以豐富對杜冠英本人的研究。

杜冠英在《玉環海防論》中指出：『顧時移世易，形勢屢更，因革變通之方與夫扼塞據險之要，雖聖人在上，聲教遠被，重譯來朝，鯨波永靖，然安不忘危者，文武將吏之職。』^{〔八〕}即主張將『因革變通之方』與『扼塞據險之要』兩者結合起來，這與中國近代海防作戰中以堅固設防陣地為依託，有重點地部署強大兵力、火力進行近海防禦的作戰思路頗為吻合。而通過對《手札》中圍繞鎮海防務的大量來往信札函電的研究，我們也不難發現，杜冠英確在實踐中貫徹了他的這一思路。比如，他非常重視地形地貌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主張充分利用險要地勢展開積極防禦。一八八四年一月，鎮海防務尚處於備戰階段，此時劉秉璋與歐陽利見就鎮海的防禦方針起有爭議，杜冠英果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竊照鎮海口，招寶拱其北，金鷄聳其南，兩山並峙，犄角相形，實為甬江關鍵。……是以言海防者，口門內外設立砲臺，河港中流攔阻船路。然必須砲臺之砲可以攻穿鐵甲兵船，放砲之臺可以抵禦敵砲轟擊；即沉下船隻當察其石塊壓力、口址深淺，置設水雷亦宜究其火藥轟動、水勢緩急。』^{〔九〕}杜冠英還繪具了『海口情勢及各臺砲路圖說』，上呈劉秉璋和歐陽利見。《手札》便留有杜冠英依據險要地形進行戰備部署的大量記載，比如，他在籌備鎮海防務時致函楊岐珍，提出『以笠山濱臨前敵，擬於山之前麓築臺，安置四百磅砲二尊、二百磅砲一尊，並擬將小港舊臺擴充培厚，以資輔助，置八十磅砲五尊，庶有事之時，敵船不敢在游山一帶停。……小金鷄山與安遠臺相對，為口門最狹之所，現擬於安遠臺旁及小金鷄山頂築臺，各置三百磅

砲一尊，前後均開砲門，用旋轉鐵路」[10]，類似論述在《手札》中時有所見，完全可視作杜冠英將其海防思想運用到具體操作中的實例。杜冠英注重近海防禦作戰的海防思想，有許多都在後來被劉秉璋等所接受，從而為鎮海之役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當然，假如從國家層面來看，以『防』為主的戰略不以角逐大洋、爭奪制海權為目的，其積極防禦的內涵與實質必有諸多不足之處，從而成為中國近代海防建設的一大弊端與隱患，這也是毋庸諱言的。

此外，《手札》涉及杜冠英與洋務、與軍隊後勤保障、與太平及徽州地區關係等方面的資料也都較為豐富，尚需細緻梳理。總之，這些資料都是今後研究杜冠英的基礎性史料，尤其是在其本人遺留資料較少的情況下，這些史料彌足珍貴。

二、《手札》是對中法戰爭鎮海之役現有史料的有益補充

中法戰爭鎮海之役，是近代中國反侵略戰爭中少數幾場取得勝利的海戰，它不僅對中法戰爭的進程和結局有着一定影響，也為中國近代軍事史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目前有關鎮海之役的史料，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當時親歷此役或與此役有重要關聯的官員、將領的著述，如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曾國荃《曾忠襄公全集》、歐陽利見《金鷄談薈》、薛福成《浙東籌防錄》、劉秉璋《劉文莊公奏議》（又名《劉尚書奏議》）以及張佩綸《澗于集》、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等，對此都有篇幅不等的記載；還有一類是對相關檔案資料的整理匯編，如一九五七年由中國史學會主

編、邵循正等編纂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以及自一九九六年起，由張振鵬主編並陸續推出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目前已出版五冊）等。此外，還有不少當時人物相關的奏議、論著、戰紀、詩詞、小說等，散見於各類出版物。這些來源多樣、體裁豐富的史料，為研究鎮海之役奠定了很好的基礎。(11)

而《手札》對鎮海之役現有史料可起到很多的補充作用。由於一般人不太會刻意對信札予以保存、留底，因此與其他史料相比，信札存世量相對而言要少得多，但其史料價值有時卻更勝一籌，特別是圍繞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重要歷史事件而形成的所謂『專題性』信札，其史料價值就更大；同時，由於信札私密性較強，加上信札主要是雙方針對某一具體事項而交換意見、商討辦法，因此溢美之詞不多，文學色彩較弱，這就使得信札所反映的歷史真實往往更加客觀，也更具現場感。

比如，鎮海之役中幾成歷史懸案的『石浦沉船』事件。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一月，南洋水師救援臺灣的開濟、南琛、南瑞、澄慶及馭遠五艦駛離上海後，於二月十三日與遠征軍總司令孤拔率領的法國艦隊在浙江三門灣外的檀頭洋遭遇。其中開濟、南琛和南瑞三艦遇法艦後，全速向南疾駛逃脫，避入鎮海甬江口內，而澄慶和馭遠兩艦因速力不濟，不得不駛入石浦灣避險，後被孤拔封鎖在石浦港內。二月十五日凌晨，澄慶、馭遠兩艦與兩只法軍偷襲小艇發生交火，雙方各有損傷，天明後，法軍兩艇被法艦『梭尼』號拖回，但奇怪的是，澄慶和馭遠卻沉入了海底。那麼，其中原因何在呢？一直以來，史學界眾說紛紜，既有『魚雷擊沉說』，也有『自沉說』，而目前主流的看法為兩艦係『自沉』。《手札》保留了清軍高、中